

政治经济学博士点建设丛书

陶一桃◎主编

深圳经济特区 年谱 (1978-2007)

SHENZHEN
JINGJITEQU NIANPU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政治经济学博士点建设丛书



010567944

陶一桃◎主编

深圳经济特区 年谱

(1978-2007)

SHENZHEN
JINGJITEQU NIANPU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深圳经济特区年谱/陶一桃主编. -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8. 9

ISBN 978 - 7 - 5017 - 8667 - 1

I. 深… II. 陶… III. 深圳市—1978~2007—年谱 IV. K926.53 -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1911 号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100037 ·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网 址: [www. economyph. com](http://www.economyph.com)

丛书策划: 左秀英

责任编辑: 张淑玲 (电话: 13910084005)

责任印制: 石星岳

封面设计: 白长江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承 印: 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980mm 1/16

印张: 37.75 字数: 54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7 - 8667 - 1/F · 7646

定价: 66.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由我社发行部门负责调换。电话: 68330607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68359418 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电话: 12390

服务热线: 68344225 68341878

卷起千堆雪

——“丛书”总序

苏东斌

这一套“政治经济学博士点建设丛书”是深圳大学政治经济学学科组为了学科建设而创作的学术专著。它直接的目的是为了开阔博士研究生的文化视野。

陶一桃教授主编的这本书是丛书的第四部。

对于中国今天的改革开放大业来讲，根本目的更在于为推进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在如何对待现代化的问题上，丛书在引证中强调：

其一，早在1874年，清末有识之士，曾经担任清廷驻外使节的郭嵩焘就提出了他的疑惑：“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未中一节也……舍富强之本图，而怀欲速之心以责于海上，将造船制器，用其一旦之功，遂可转弱为强，其余皆可不问，恐无此理。”

而另一位薛福成在《四国出使记》中在引证了新加坡、香港、开辟商埠后经济繁荣的事实后，发表了一段十分精彩的议论：“夫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创国造家、开物成务之命脉，迭著神奇之效者，何也？盖有商则士可行其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植，而植益胜；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此其理为从前四海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所未讲。而外洋创此规模，实有可操之券，不能执中国崇本抑末之旧说以难之。……盖在太古民物未繁，原可闭关独治，老死不相往来；若居今日地球万国相通之世，虽圣人复生，岂能不以讲求商务为汲汲哉！”薛福成在这里为资本主义在中国鸣锣，要求让商人从“四民之殿”的地位上升到“握四民之纲”的地位，这确实是“从前四海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所未讲”的新道理。

他更深刻地论述“今之议者，或惊骇他人之强盛而推之过当；或以堂堂中国何至效法西人，意在摈绝而贬之过严：余以为皆所见之不广也。”他说：西方的科学、文化、技术和经验，是人类文明的积累，“乃天地间公共之道，非西人所得而私也”。既然欧洲在历史上接受过东方文明的影响，“中国又何尝不可因之”？讳疾忌医和因噎废食都是不对的。他说：只要中国人善于学习、敢于竞争，“又安知数千年后，华人不因西人之学，再辟造化之灵机，俾西人色然而惊、蹙然而企也”！^①

其二，1965年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他的《激荡的百年史》中更加精辟地分析了科学技术与制度因素的深层关系。他指出：外国文明的输入很容易破坏本土社会、文化和精神上的统一。在德川末期，一些思想家们曾预想用“西方的艺术、东方的道德”或者是用“西方的学识、日本的精神”作为对付这种破坏的公式。

但是，这样的公式与实行近代化是相背离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受倡导的文明原本是一个统一体，很难只单单采用它的科学文明技术。如果要采用西方先进的军舰和武器，就必须修建配合它的造船厂和兵工厂，进一步地为了使造船厂和兵工厂的机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就必须让构成它基础的经济活动能够得到顺利进展。

过去的儒教伦理将追求利润视为不道德的行为，这就产生了矛盾。因此，想要拥有军舰就必须影响到该国的文化。

然而，就算业已输入西方国家的科学文明技术，要吸纳其政治观点、思想方法等形成其文明基础的东西，仍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些所谓的价值体系，如果没有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用自己的力量努力地创造它，那么，努力改革的东西就不能够成为人们一种真实的道德基础。

因此，在一种不得已的情况下，采用外国文明的国家便会面临一种困境，这种困境是深刻且令人进退维谷的。

在那个时代有个学者曾经说：“孔孟的道德已经衰落了，西方的理论还未进入，这就像太阳已经落山，而月亮犹未升起时的情况。”

而当时恰恰是美国占领军在日本国土上连续推进非军事化和民主化。

^① 钟叔河：《中国本身拥有力量》，第162~16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9月版。

日本人不仅要关心每天的生活,还要努力思考日本今后的发展。占领军们开始指示日本政府必须要进行一种彻底的改革,这样的变化不知道是福是祸。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驻军日本的占领军,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占领军。美军不仅占据着胜利者的地位,而且还以改革者的身份推进日本的“非军事化”改革。

美国将二战爆发的原因归结为日本和德国的军国主义,因此他们认为,只有对日本进行改革,瓦解日本军国主义存在的社会结构,削弱日本的军事能力,才能构建世界和平。抱着这样的目的,他们在进驻日本之前就制定了详细的措施,当军队进驻日本后,就开始按照计划在日本推进军事化和民主化。

美国的占领军在1945年8月末驻军日本后,就开始实施了以下的措施:在非军事化方面,首先在9月11日逮捕了东条英机等数名主要战犯,接下来解除了日本军队的武装,废除了日本的军事机构,一些国家主义的团体也被解散(1946年1月);在民主化方面,进一步整肃了一些不受欢迎的公职人员,思想警察和政治警察也被废除了(1945年10月),赋予妇女参政权(1945年12月),组织工会(1945年12月)等等。

在战后一两年之内占领军又采取了土地改革、教育改革、解散财阀和制定宪法等措施。这些巨大的变化简直可以称为“不流血的革命”^①。

这两段话所表达的是制度是何等重要!

但是,制度经济学一再提醒人们:不仅制度规则是由人来制定的,而制度执行更要依赖于人来完成。而作为经济人,又都是在追求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所以,任何意义上的人性假定,都离不开具体人的具体行为。

而在浸透着儒家礼仪和缺乏公民意识的国度里,是一个长期“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家族制和宗法组织”的国家,用王亚南先生的话说,这种情况“在专制——官僚的政体实现以后更加强化了,但在这以前,却显然存在着这样一个可供官僚政治利用的传统。国与家是相通的,君权与父权是相互为用的”^②。“家不可一日无主,国不可一日无君”;在人们的意识深处两者是相提并论的。

① [日]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版。

②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第4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遵循这样的传统,国人对家庭的忠诚很自然地就转化为对国家的认同。“在家庭生活中灌输的孝道和顺从,是培养一个人以后忠于统治者并顺从国家现政权的训练基地。”^①“皇权主义最深厚的根基,正是这种家长制。”^②

在这种环境下,国家一旦放弃了对人权的尊重和对产权的保护,大众也就自己丧失了自主意识。于是从上层的人治社会到下层的无法无天,便使制度因素更加虚拟化。

于是,我们评价历史,也就不能仅仅依据个人的主观动机,甚至也不能仅仅依据他的动机所实现的程度,而只能依据大众的基本实践结果。对于所谓的“好人好事”是如此,对于所谓的“坏人坏事”亦是如此。

正如苏联的改革,对政治人物来讲,是失败了。因为作为改革的领袖戈尔巴乔夫几乎丧失了一切特权(无论别人如何分析,也无论戈尔巴乔夫本人如何解释,这一后果决不是他本人所希望呈现的);而对政治事件来讲,却有另外的结果。因为它开启了苏联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从一元帝国向多元联合的全面转型的新时代。若按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核心价值观念——自由来判断,“无论如何,俄罗斯人民要比在苏联时代获得的自由要多得多”^③。对于计划经济时代的苏联,执政8年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这样判断:“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④而面对今天的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型,胡锦涛主席则给予了权威性阐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高度评价普京总统为中俄关系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普京总统执政以来,俄罗斯社会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友好邻邦和战略协作伙伴,中国人民为俄罗斯人民取得的显著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⑤

①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2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

②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第13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③ 资料转引:普京:“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北京日报》2008年1月21日。

④ 同上。

⑤ 资料引自:《人民日报》2008年3月17日。

也只能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才常说:作品的主题远远大于作家的思想。于是,如果我们再追问,人和制度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答案便一目了然了,那就是,制度绝对是人制造的,而人又绝对不能随心所欲。

当我们赞同任何动物、生物、乃至物品的本质都是预先被设计好了的,而人却只能通过自我选择来创造自己的本质;当我们确信人生不是别的,乃是自我设计和自我实现的过程,放弃了选择,也就是放弃了自由;当我们承认“上帝死了”的时候,自己才有了称得上“人”的尊严感。可以说,作为哲学家、思想家的萨特,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

对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一改革目标,既不是当年那种颇有影响的传统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加上市场因素的“兰格模式”;也不是再来一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第二次“洋务运动”;更不是使现代经济加上传统政治、文化,从而在社会的统一体中还能够长期共存的另一种状态的“一国两制”。而是从对传统社会主义的质疑开始,经过全面而彻底的改革,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最终实现从体制改革到制度创新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语)。所以,我们既不能把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当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加以完全肯定,也不能把人类社会的普世追求——市场经济当做西方自由主义加以根本否定。还是那句话:市场经济的运行决不能建筑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之上。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理解,邓小平既多次表明过对于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还不完全清楚”,又在给什么是社会主义本质做最后规定时只给出价值判断,而决不做任何具体的制度性安排(即“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见《邓小平年谱》第1343页)。在这里,我们也就不难发现,邓小平的这一本质规定,是与马克思的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这一核心价值与最高命题,无论从表述结论还是到思维方式以及再回到研究方法,都是一脉相承,逻辑统一的。

涉及本书的内容,我是这样认识的。中国经济特区的创立与发展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是巨大的。它贡献了一个新体制的伟大实践——市场经济的实践;又贡献了一种敢闯、敢冒的创新精神。所以它的贡献远不止是建成一座现代化的大城市。

但是,中国经济特区的性质却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济特区有着本质



上的不同。

其他国家的特区大体是在一个定型的、成熟的体制内,采取更加特殊的优惠政策,来达到局部的、暂时的利益。美国、日本的特区就是如此。它们的目的决不是为了试验而推广。

而中国的经济特区则是一种试验、一种探索,充当排头兵、“率先”角色。现在的各种试验都是为了以后的推广。

我把它归纳为:中国经济特区的建立与发展是为了探索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模式;是为了寻找从普遍贫困达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

所以,对中国经济特区的研究,决不是一个特殊的、区域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性的、市场经济形成与发展问题。对深圳如此,对滨海新区如此,对重庆“新特区”也如此。

但是,我们还应该清醒认识到:在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后,对这类特区今后的作用却不可高估。

第一,它们仅仅是一个个经济特区,而不是政治特区、文化特区、社会特区。仅仅靠经济特区,很难实现全面的现代化,况且真正的全面现代化是不可能只在一个地区率先实现的。

第二,任何一个特区都不再具有试验的垄断权。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央不仅希望深圳,同时也要求上海、北京实现几个“率先”。所以,多年来我一直说,深圳并不是一个永远的“经验批发商”。今后要充分发扬的特区精神其主要内容就是创新:体制创新和制度创新。

第三,经济特区的本义是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地区。一旦中央收回了特殊政策,特区的性质也就从根本上转变了。即便还叫特区,也仅仅具有历史与象征意义。我认为,今天“特区”的概念已经由实体转化为精神了。这决不是一个感情上愿不愿意接受的问题,而是一个是否承认特区概念的科学性的问题。

同时,即使对于深圳以往的经验,也具有时空的局限,深圳今后的艰难,依旧是漫长而曲折的。从体制改革到制度创新,深圳所追求的目标还远远没有达到。所以,忧患意识将贯穿在深圳发展的全过程,也就是说,被称为“第二次革命”的改革,仍然是深圳的第一法宝,重中之重。

毫无疑问,一条中国现代化之路一定要显示出民族特色与反映出历史

阶段性来,我们强调“中国特色”就是要说明它的民族性、地区性、国家性;我们指出“初级阶段”,又是要表示它的时代性、后进性和渐进性,没有了这两点,当然也就没有了中国现代化每一个过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是,无论这种特色“特”到什么程度,也不管这种“发展阶段”进入了哪一时期,现代化道路一定有它的“本色”和“同质”。所谓“中国特色”只能“特”在形式上,而不是“特”在内容上,只能“特”在发展道路上,而绝不是“特”在发展目标上。我们在说明“中国特色”时,应强调创造性吸收“人类文明一般”,而在确认“初级阶段”时,则更强调体现时代性的“国际惯例”。我们决不能以“中国特色”来拒绝由“本色”所带来的规范要求,更不能用“初级阶段”去否定本来应当实现的各种现代化进程。

这样,我们在强调“中国特色”的同时,必须清醒认识到,努力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果实与营养,这不仅反映了我们的胸怀,更反映了我们的聪明与智慧。因为从实践的意义上讲,更多的东西是“利与弊”,而不是“是与非”。许多东西并非都一定要兵戎相见,更多的则可以融会贯通。我们决不赞同当年“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狭隘民族主义观念,决不赞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化蓝本,而是要在经济全球化、区域化中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开放也一定包括心态的开放与平和。所以,经济、政治、文化之间既不能可能视同秦越,也不应当以李代桃。

即使对于作为旗帜的“中国特色”,也必须领会精神实质,而不是去咬文嚼字。

第一,“中国特色”只说明“有所不同”,并没有正面回答“究竟是什么”。因为权威的解释是既不同于传统的苏联模式,又不同于西方模式。

第二,“中国特色”字面上并没有体现价值判断,不说明这种特色究竟是好是坏。

第三,可以说,无论是中国的革命之路,还是中国的建设之路,都始终充满了“特色”。如农村包围城市,大跃进,人民公社,乃至“文化大革命”。所以,它并不总是具备时代的先进特征。

任何特色只有与先进性相结合才能具有真正的竞争优势。

可见,作为旗帜的“中国特色”,其精神实质与基本内容仍然应当是民主、繁荣、自由、幸福等。

我们既不能仅仅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那里的早期、中期、晚期的文本中去寻章摘句来自己勾画出基本原理,也没有必要从它们矛盾着的不同论述来演绎出自己总结的基本原理,而应当从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中,核心价值的内容中去总结出基本原理,如建设“自由人的联合体”,追求“人的全面解放”等等。即使我们真的有一天在文本中发现了马克思说过:“中国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可以搞市场经济”这句话,我们也没有必要从这里来证明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样,尽管我们从文本中反复看到“未来社会就是要消灭商品”,也不能说明我们今天搞的市场经济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了。

我们应当把经济学的经典文本当做一个学者的研究过程的不同思路 and 不同角度。他们并不是为我们写什么标准教科书,我们没有必要再搞他们的每一句话的“两个凡是”了。

在这里,主要的还不是一个能否与时俱进的发展与开放问题,而是一个寻找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整体学术灵魂,核心价值问题。

当年,马克思主义者的佩里·安德森在研究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学说时,特别着重“历史可能性”时刻。因为在人的行为面前,他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多么神圣或者多么为人所熟知的体制,都不是原则上不可触动的:“制度的格局比人们认为的要更柔弱和可塑”。这不禁叫人记起波普尔的反历史决定论的坚定主张。因为他的全部出发点都是历史是人创造的,社会的发展不会如同物理学那样,存在一种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既没有时代制约,又没有国情限制的一般规律性。

当然,人也决不会永远专横而自负下去。因为正如洛克所说:“人们享有公民自由的资格与他们对自己的稟性施以道德约束的愿望成正比,与他们把热爱正义置于个人贪婪之上成正比。”^①这也就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卷起千堆雪。

2008年8月

① 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第二章开头引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

本书序言

把改革写在岁月里

陶一桃

这里记录的是一座年轻而充满创造力的城市——深圳，不同寻常的令世人瞩目的成长历程。在中国历史上，恐怕还没有哪一座城市能像她那样，以其自身的产生预示着一个时代的开始和另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没有哪座城市能像她那样，以其自身的发展体现、引领着整个国家的制度变迁的方向，并创造着一种崭新的富有绩效的社会发展模式；更没有哪座城市能像她那样，以其自身的不断变革书写着社会转型的奇迹，并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创造着创新的理念、精神和理念。

这里记录的不仅只是一座城市的发展岁月，而是一个国家改革路径与模式的深刻的探索轨迹，以及一个民族寻求富裕的奋斗历程。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深圳是一座虽然年轻但却拥有历史，虽然新兴但仍然拥有积淀的城市。她以年轻的28年记载着中国改革的30年，而这30年不仅是对以往近半个世纪传统体制的反思与批判，更是对未来中国发展目标与方向的确定；她以新兴的28个岁月为转型的中国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而那些富有冲击力和挑战精神的思想与观念，摧毁的不仅仅是桎梏改革的精神枷锁，更是在传统体制下一直被视为绝对真理的那些“神圣”的东西。今天的深圳给予人们的不仅只是高楼大厦，霓虹闪烁，绿树花园，富裕后的尊贵享受，更有比大厦更能震撼心灵的改革精神，比霓虹更加耀眼夺目的创业情怀，比绿树花园更具凝聚力和感染力的宽容的城市文化，比富裕后的尊贵更加珍贵的良好的社会法制环境与制度环境。

深圳经济特区作为特殊政策的产物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她标志着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开始，标志着国门的开放，标志着思想的解放与观念的更新。可以说，3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从在中国这

样一个计划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创立市场经济的绿洲开始的。深圳作为计划经济最薄弱的地方，凭借着地位优势（毗邻香港）首先成了这块绿洲。建立特区这种制度安排，不仅打破了传统体制的一般均衡状态，而且还使非均衡的社会变革成为最佳的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如果说，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大背景，那么普遍存在着的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则是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最严重的社会资源约束。建立特区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正式制度安排，不仅大大减少了在传统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制度变迁的阻力，降低了传统体制占支配地位的情形下制度创新的成本，而且还成功地规避了改革的风险，从而使制度变迁的绩效在短期内就能迅速显现出来，并卓有成效地示范全国。30 年后的今天，当我们从制度安排的角度来研究特区，当我们把非均衡增长引入我们的研究视野，特区就不仅仅是特殊政策，而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变迁的模式与路径。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特区还要“特”下去，对经济特区的肯定，应该理解为对中国社会制度变迁模式和路径的认同与肯定。

早在 1984 年邓小平同志就说：“深圳经济特区是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①应该说，在中国社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深圳很好地完成了它成立初衷所赋予的历史使命——改革开放的示范地区、市场经济的试验田、对外开放的排头兵。深圳是一个奇迹，是一个制度创新的奇迹。作为中国制度变迁的试验田，深圳的发展集中反映了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制度绩效。而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速度，正是这种制度绩效的突出体现。因此可以说，在过去的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深圳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转型社会特有的“矢放效应”的结果。所谓转型社会的“矢放效应”是指由于制度变迁，改变了原来体制内部的无效率或低效率的资源配置状况，从而带来了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和财富规模的迅速提升。与此同时，经济起步国家原体制内存有的社会经济多领域亟待发展的空间、开放政策对国内外资本、技术等资源约束的卓有成效的解决，以及由此带来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年，第 84 页。



的更加广阔的国内外市场和亿万人民渴望尽快摆脱贫穷的迫切愿望，这些都使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成为需要，更成为可能。

经济特区作为特殊政策的产物，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中完成市场经济的实践，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然而，经济特区作为制度变迁的模式与路径，它不仅要以自身的实践促进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而且还要以自身的发展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1992年邓小平同志就说：“到本世纪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两个地方都要做好标兵……要用实践来回答。……实践这个标准最硬，……实践不会做假”。^①在审阅十四大报告第四稿时邓小平同志又说：“我赞成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这个提法，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②

制度是镶嵌在制度环境之中的，没有完善的制度环境，就不会产生有效的制度安排。同时，原本有效的制度安排，在无制度环境的支持下，也会丧失制度的原有功能。如，没有保护产权的制度安排就不会有公平有效的市场交换，没有诚信体系的确立，就不会有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没有完善的市场运行规则，就不会有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繁荣。因此，从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的角度，经济特区的制度变迁效应丝毫不亚于成立之初的制度创新效应。历经近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的积累，深圳在市场经济体系营建上已具有了相当的经验、能力和实力。尽管28年后的今天，深圳并不是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唯一地区，但率先走向市场经济的经历和毗邻香港的区域优势，使深圳能够学习、借鉴香港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从而完善自身，示范全国。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深圳所处的地缘优势，使今天的深圳依然具有对外开放最便捷的窗口的地位。28年前人们希望通过这一窗口了解世界、走向世界。今天这个窗口在把中国引入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把国际惯例和市场经济通行的规则带入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之中。以开放促改革，已经成为今天的深圳特区制度创新的坚定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特区从初创到今天，其制度变迁的功能已发生了改变。如果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40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47页。

说初创之时主要是以示范效应在全国确立市场经济体系,那么今天则是要以制度创新的方式“以开放促改革”,即推动改革的深化。经济特区这种内在功能的变化,正是中国社会从以突破传统体制为目标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向以收获潜在利益为动机的诱致性变迁演变的标志。尽管市场经济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但经济改革还没有真正完成,改革的道路依然很漫长,经济特区——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变迁模式还应该一如既往地 在制度创新中发挥示范作用。

尽管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是从经济领域中展开的,但改革从来都是社会的改革,它必然涉及政治、经济、制度、法律等方方面面。甚至可以说,没有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的保障,真正的市场经济体系就无法确立。因此,深圳作为经济特区,还应该在以提高政府执政能力为宗旨的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上,走在全国的前列。

中国社会的改革是以社会制度转型为特征的。因此,政府职能的转变必然构成了制度变迁的重要内容。纵观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程,正是“全能”政府逐渐走向“守夜人”政府的历程,也正是“权威”政府逐步走向公仆政府的历程。政府是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的发动者,也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倡导者,同时还是制度这一公共物品的最大的、最有效的供给者。政府的文明程度决定了制度的文明程度,从而决定了一个社会政治的生活文明程度和开明程度。正如穆勒所说:“虽然国家不能决定一个制度如何工作,但是它却有权力决定什么样的制度将存在。”明智的政府可以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中,有效地降低社会的变革成本,而政府的低效率、理性的有界性和认识上的局限性,则会增加社会变革的成本支付,甚至会使社会失去最佳决策或机会的选择,从而丧失收获社会变革的最大收益的可能性。没有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保障的市场经济,是短命的市场经济。在政府的权力还需要政府的权力来剥夺的体制里,政府的文明决定了社会规制的文化,而文明的社会规制是自由民主的市场经济发展的保证。

经历近三十年的发展与积累,深圳这座城市已经步入了稳步增长的成熟时期。尽管在过去的多年里,深圳一直保持着 15% 以上的增长速度,人均 GDP 也从 2006 年的 5664.39 美元上升到 8691 美元,并日渐接近世界

银行确定的从发展中状态进入发达状况的标准——人均 GDP 1 万美元。但是，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那种耀眼的增长速度，有可能，并且应该成为曾经辉煌的历史。首先，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因此，政府可以预期，但不能违背经济增长规律从而制定经济增长速度。如果说曾经的高速度是改革的需要（当然也是改革的结果），那么如今的适度增长则是持续发展的需要。第二，经济增长速度是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它体现了一方政府的执政绩效。但是，它绝不能成为一方政府的政绩考核的唯一目标。一旦经济增长速度成为衡量政府政绩的唯一指标，增长本身就会从内容变成形式，变为上升的数据。第三，任何社会的经济增长都是要支付代价的，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更合理的指标不是 GDP，而是 NEW（社会净福利指数）。NEW 是从 GDP 中减去为获得 GDP 社会所不得不付出污染等一系列代价。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已陷入以更多的资源消耗换取财富的增长时，最终是社会财富总量的减少，而非增加。第四，衡量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不仅包含经济增长速度（这是重要的指标），而且还不可或缺的必然包含制度文明、社会福利感等非经济因素。对于一个成熟的社会来说，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当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对非经济因素的关注，直接关系到财富创造的意义和使用的社会价值。

就深圳而言，由于它是一个一直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轨道上运行的城市，与此同时，自然资源的先天不足和劳动力要素价格优势的逐渐消失，实事求是的、体现适度增长理念的发展速度，必将是其保持持久繁荣的理性选择。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一个稍小一点的增长百分比，也能带来社会经济的较大的绝对增长量。对国民而言，生活质量的提升远比增长速度本身更重要。因为，生活质量和福利感的提升，意味着社会剩余在国民中的更大范围的分享。未来的深圳，应该充分利用资本和高科技的比较优势，以高附加值的产业发展为主导，以金融服务业为支撑，逐渐步入有钱有闲的成熟、稳健、富裕的社会。

近年来，深圳市政府提出这样的理念：向改革创新要发展的动力，向改革创新要发展的优势，向改革创新要发展的资源，向改革创新要发展的空间。我以为，这是一个战略性的思考，这一思考本身不仅明示了深圳这



座以改革创新起家的新兴城市的生命力之所在，而且还以一种巨大的极富感染力和感召力的精神力量，鼓舞着正在探寻发展路径的深圳人，并将深圳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在推动中国市场经济实践中所发挥的窗口、试验田、示范区的作用，与时俱进地提升到了一个自我超越的更高的层面，那就是从“试验田”意义上的特区，走向了“精神”层面的特区，使曾经培育、支撑了这座城市的魂——“敢闯”、“创新”，继续培育、支撑着这座城市，并成为这座城市生生不息的永远的精神。

深圳既有改革创新的土壤，又有改革创新的传统，缺少的不是改革创新的能力，而是保持改革创新精神的意识。深圳最初的吸引力并不是她的高楼大厦、现代化街道和丰厚的收入，而是改革开放的氛围，较之内地传统体制宽松的机制和传统体制依然占据支配和主导地位的内地所无法提供的创新机会。正因为如此，最初闯深圳的人既不是做着发财梦的淘金者，更不是做着黄粱美梦的机会主义者，而是期望寻找发展空间，借以施展在内地传统体制中被压抑着的个性和创造力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和“叛逆者”。正是那些在当时不怕丢掉公职的“吃螃蟹”的人和“叛逆者”，形成了深圳这座城市几乎“与生俱来”的改革创新的土壤。另一方面，靠改革创新起家，靠改革创新发展，靠改革创新而闻名中外本身则证明：改革创新不仅仅是深圳的传统，而且还是深圳重要的政治资本。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讲话中说：“深圳的经验就是敢闯。”保持当年的敢闯精神，守护往日的创业情怀和创新意识，是深圳能够继续前进的保证。我以为，能够导致深圳人丧失改革创新意识的主要原因不是富足、安逸的生活，而是对待富足、安逸生活的态度；不是已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而是对待成就的评价；更不是她在全国曾经“优越”的地位的变化，而是对待这种变化的心态。今天的深圳人应该把富足、安逸当做继续改革创新的物质基础，而不应该把它们看成是改革创新后的理所当然的享受。深圳既不可能以从前的成就来继续证明今天的辉煌，更不应该被曾经辉煌的历史捆住现在的思想和脚步。过去的“成就”使深圳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标兵”，但深圳绝不可能原地踏步还能永远成为邓小平同志当年所期待的改革开放的“标兵”。尽管特殊政策取消了，但深圳还在，取消的只是特殊政策本身，改革创新的精神不应该随着特殊政策的取消而一同丧失。取消特殊政策本身